

荔园国学丛书

主编 / 景海峰

汉魏六朝文体论与 文体观念的演变

杨东林 — 著

非外借

 科学出版社

荔园国学丛书

主编 / 景海峰

汉魏六朝文体论与 文体观念的演变

杨东林—◆—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对汉魏六朝文体批评与理论进行阐释的观念史著作。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起源演变,尤其是文体论自身在汉魏六朝各个历史段落中的特征,进行分期论述,寻绎文体论理论形态和文体观念在汉魏六朝的发展脉络。全书以“文体”概念蕴含的历史演变作为论述的中心线索,突出文体研究与文学研究、文体观念与文学观念的内在联系,力图使“文体”概念在原始语境中彰显出本土与本体的理论本色。

本书适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及高校中文系师生阅读,也适合一般文学爱好者、国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文体论与文体观念的演变/杨东林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11

(荔园国学丛书/景海峰主编)

ISBN 978-7-03-055192-4

I. ①汉…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文体论—研究—唐宋时期
IV. ①I2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0559 号

责任编辑:郭勇斌 周 爽 / 责任校对:王萌萌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1/2

字数:214 000

定价: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丛 书 序

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始于1984年，在新一轮的国学热潮兴起之前，已着先鞭。

那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1983年9月即诞生了特区的第一所大学——深圳大学，并在建校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当时，国学一词并不流行，国学之说尚有禁忌，为什么会用这个概念来命名一所人文学术研究机构？这就要从它的创办人汤一介先生说起了。汤先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中国哲学教研室的主任，他在80年代初赴美访学时，接触到了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许多新信息和新理念，这在当时封闭的状况下是有很多新鲜感和强烈刺激的，也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在他与夫人乐黛云教授一起回国之后，恰逢深圳大学正在筹办，于是应张伟校长的邀请，乐先生出任了中文系的主任，并创办了比较文学研究所，而哲学系暂不能成立，只好先办一个偏重中国哲学的研究机构，这便是国学研究所，由汤先生主持。国学一名，当时的人们并不熟悉，但具有家学渊源的汤先生却不陌生，民国时期的北大即有国学门，办有《国学集刊》，而矗立其间的“台柱子”便是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所以，当时用了国学之名，究诸原委，实有其缘，是不是有先见之明，就另当别说了。

国学研究所成立之后，恰是当时国内的文化大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在汤先生的带领下，国学研究所的同仁们投入其中，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举其要者：一是创办了大型的国际性学术集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先后出版4辑，发文百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二是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集中了一批中心城市的知名学者制定规

划，对80年代后期国内“文化热”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三是与当时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两届国际“中国学”研讨班，为全国30余所高校培训了100多名从事比较文化和汉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四是较早和海外的学术界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与香港的几所高校有了密切的交往；五是在古籍整理方面，参加了广东高校“岭南丛书”大型项目，并在古籍整理的电子化方面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这些活动的开展，在当时都是借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国内具有一定的拓荒意义，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国学研究所在深圳大学建校之初的80年代，也为学校的文科建设、特别是传统学术研究的积累，为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高校的人文学术遭遇了寒流，传统学科一蹶不振，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也一度沉寂了下来，几乎陷于停顿。正所谓斗转星移、时事难料，在学院内部的传统文化研究遇到顿挫、文史哲学科陷于生存困境之时，在市场经济活力的冲击和挟裹下，此时在社会上却悄然兴起了一股国学潮，传统文化在社会上有了复苏的迹象，国学理念也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熟知。这个翻转本身就很有戏剧性，而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学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大国地位的显豁，则演绎出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剧情，锣鼓铿锵、人腾马跃、各色粉墨、正谐相随，一幅好不热闹的场景，实为近代以来所罕见。

经过了20年的发展，国内的国学热，潮涨潮落，几度翻腾，浪花相逐，亦泡沫堆积，呈现出了远比最初的时候要复杂得多的面相，可以说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到了今天，对国学的理解和国学之研究早已不是往昔的景象了，也已不具有解释的统一性，其边界宽泛得已经让人无话可说；无处不在的国学、无人不谈的国学，五花八门的杂乱样子，又几乎让人不忍置喙，不知从何处落脚了。清代学者凌廷堪（1755—1809年）在论及天下学术变迁之大势时，有谓：“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亦必有一二人矫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毫耄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校

礼堂文集》卷23)而当此时刻,国学作为一种时代的表征和映照学术潮流之走向的标尺,是处在“将变”“既变”之际邪?抑或已经有了一点“天下相与安之”的苗头呢?这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如何认识、如何判断之,或者采取怎样的态度、怎样的行动来对待之,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必强求一律,更没有必要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来,判断权完全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

作为高校的国学研究,当然有它的学术持守,不能随波逐流;有它的学科规范,不应漫越无度;有它的独特责任,不必包打天下。做自己应该做的、做自己能够做的、做自己必须做的,是从事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高校教师的职责,也是时代所赋予的任务。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集中了文史哲三个学科门类的人马,在国学研究所和国学本科实验班的基础上,又于今年新成立了国学院,隶属于学校,挂靠在学院,实行一体两牌的互动机制,凸显出国学研究的平台性、基础性和融合性,以国学来寻求人文学科之间的内在交融和体制创新,以博雅教育为宗旨,努力为人文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创造新的增长点。根据我院现有的学科优势和师资特色,新的国学学科架构,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为导向,以社会服务为目标,努力寻求国学建设的突破口和国学发展的新路径,强调融合文史哲不同学科之间的力量,以凝聚起人文基础学科的创造力和吸引力,为提高深圳大学文科建设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和目标,我们在学校领导和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下,申报了“以国学为平台的人文基础学科融合与创新”项目,得到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的资助。作为该项目的具体实施计划之一,我们编选了这套“荔园国学丛书”,集中收入我院教师在国学研究方面的新著,以贡献予社会。

深圳大学地处南国,荔子飘香,别号荔园。每年的六月份,荔枝成熟,挂满枝头,又是一年丰收时,也恰临毕业季。校园里,行将走入社会的学子们,身穿蓝袍,穿行于红荔绿荫之间,构成了一幅最美的图画。我们的“荔园国学丛书”正是伴随着这样的校园美景一同诞生的,愿它像学子们一样,带着成熟,带着希望,走遍天涯。

景海峰

2017年6月5日于荔园

目 录

丛书序

绪论	1
第一章 先秦的文体观念	20
第一节 先秦的文体分类	20
第二节 文体渊源于先秦说	26
第三节 有关“体”概念的思想渊源	33
第二章 汉代的文体研究与文体观	41
第一节 史学目录学传统下的文体分类与辨析	41
第二节 汉代的应用文体研究	47
第三节 汉代的文体观念	53
第三章 魏晋时期文体批评与文体观念的自觉	68
第一节 建安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文体论的转变	68
第二节 才性论与文体论的结合	84
第三节 从艺术特征上论文体	90
第四节 集的编纂与体的辨析	97
第四章 南朝文体论的发展与文体观念的成熟（上）	111
第一节 杂文学观念下的文体分类	111
第二节 文体分类与“文笔之辨”	119

第三节 文体源流论的发展衍化	129
第四节 论古体与今体	138
第五章 南朝文体论的发展与文体观念的成熟（下）	152
第一节 刘勰的“论文叙笔”	152
第二节 刘勰的文体观念	163
结束语	187
附录 读《文心雕龙·丽辞》札记	190
主要引用及参考书目	191
后记	203

绪 论

一

汉魏六朝文体论不仅是其时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环节，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文体学得以确立和走向成熟的开始，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特别是文体学史中地位特出，影响深远。

在现有的汉魏六朝文论研究论著中，文体论的研究进入了愈来愈多的学者的视野，但大多还只是作为论述的一个角度或一个侧面，实则，文体论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它是汉魏六朝文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实在是汉魏六朝文论的一个立论基点。汉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基本上是在《毛诗序》《诗谱传》等诗体论和刘安、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王逸、刘歆等的辞赋论基础上展开的。而魏晋时期曹丕“文气说”、陆机“缘情说”的提出，则与“四科八体”和“十体”的对文体表现对象和艺术特征的辨析密不可分。进入南朝，人们对文学特质的探讨，同样是建立在体类辨析和“文笔之辨”的文体认识深化的基础之上。而作为六朝文论集大成的《文心雕龙》，上篇论文体，下篇论文术，由其篇章结构的安排即可看出，文体论是刘勰文学理论立论的基础。朱自清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写了题为“诗文评的发展”的书评，针对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文体论立专章而评论说：“他在《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里特立专章阐述‘文体类’的理论。从前写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的人都觉得文体论琐屑而凌乱，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可是读了罗先生的叙述和分析，我们能以看出那种种文体论正是作品的批评，不是个别的，而是综合的。这些理论指示人们如何创作、如何鉴赏各体文字。这不但见出人们如何开始了文学的自觉，并见出六朝时那新的‘净化’的文学概念如何形成。这是失掉的一环，

现在才算找着了，连上了。”^①考察罗根泽先生以后的文学批评史著作，文体论的研究事实上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一些著作甚至很少涉及文体论。即使是进入了许多研究者的论域，也不过是对其时的文体分类进行一下归纳排比，并没有认识到文体论作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理论构架基础性环节的重要意义。

汉魏六朝文体论作为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形成期，其理论形态很快就走向了成熟，无论是形式、内容还是方法，都为后代文体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基本品格在汉魏六朝时期便得以确立了。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以至萧统《昭明文选》，形成了后代文章总集聚类区分和附论文体的传统，如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及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即沿袭此种传统。而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基本体式及方法奠定了后代文体专论的体制格局，如清代孙梅的《四六丛话》、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在体例上即承袭刘勰。中国古代文体论探源宗经的思想，选文定篇、重视流变的方法，在汉魏六朝文体论中也基本定型。因此，对汉魏六朝文体论的全面清理和深入考察，是中国文体学史研究的基础工程。

综上所述，汉魏六朝文体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但汉魏六朝文体论的研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资料稀少。除《文心雕龙》文体论较为完整外，相当一部分文体专论如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李充的《翰林论》只余断编残简；许多反映文体观念的文章总集选集及文章目录著作均已佚失。如仅囿于文体论本身资料，难免有零乱琐碎之感，要构拟一史的逻辑的系统建构，确实是有点捉襟见肘。

二是各别文体的个案清理工作不足。汉魏六朝文体体类丰富，诗赋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史论述的重点，研究已相当深入，但其余大量的文体我们还不甚了然。近年来这一状况已有所改变，如吴承学师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论及的“盟誓”等文体皆为学界尚未注意到的文体。^②汪桂海的《汉代官文书制

①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49页。

②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度》从史学角度着眼，对汉代官文书进行了考察。^①但这样的文体史研究成果毕竟还是不够充分，文体论的研究仍面临着困难。

三是理论方面的局限。一些研究者虽已逐步认识到文体论的重要性，但未能将文体论作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一立论基点来看待，未能将文体论融入当时的文学理论批评中，多把研究重点放在文体类分和文体辨析上，这种归纳性的研究因材料的缺失难免在某些理论环节上暖而不明，妨碍了对汉魏六朝文体论作系统性、整体性的论述。

吴承学师在《文体学源流》一文中说：“中国古代文体学在文学批评中占了颇大的比重，可惜人们很少对此进行全面的史的考察，论者的眼光绝大多数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对文体学的起源和发展演变的研究显得十分不足。所以，我们必须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为大胆地探索。”^②即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体论，我们同样也缺乏史的全面考察，仍需做进一步的清理和总结。而现有的研究成果似乎并未对文体学的源起和演变，尤其是没有对文体论自身在各个历史段落中的承传及其特征进行集中的分期研究和论述，而且对作为魏晋南北朝文体论之源起的先秦两汉时期亦缺乏总体的把握。因此，本书以“汉魏六朝文体论与文体观念的演变”为题，并追溯其源起至先秦，分为先秦、汉代、魏晋、南朝四个历史阶段，探讨文体论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特征，力图寻绎出文体论理论形态和文体观念在汉魏六朝的演变脉络。

二

由于20世纪未有一部汉魏六朝文体论研究专著发表，所以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分布极其散乱零碎。除了文学批评史著作中的有关论述外，较为重要的文体论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研究、《昭明文选》研究，以及“文笔”“诗笔”问题的研究中。此外，在诗论、赋论、文章论的研究中也有一些有关汉魏六朝文体论的论述。

而与文体论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文体史研究成果则相对集中。20世纪

①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② 吴承学：《文体学源流》，《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406页。

的一百年中，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和学科体系建立以来，发表了不少分体文学史的成果，如诗史、赋史、乐府诗史、骈文史专著，当然也有一些单篇论文。

现选择20世纪有关汉魏六朝文体学史、文体史及其他相关论述之要者，分为三期，以祈大致勾勒出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一）20世纪50年代前的研究情况

在20世纪前半期出版的一些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如罗根泽、郭绍虞、方孝岳、朱东润诸家，皆涉及汉魏六朝的文体论。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论及挚虞、李充；^①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内有二节“挚虞的流别论”“昭明《文选》发挥文学的‘时义’”，关乎文体论；^②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设一专节“从文体的辨析到文笔的区分”，则试图对魏晋南北朝文体论进行概括和总结。^③总的看来，作为汉魏六朝文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文体论在各家批评史著作中所占篇幅既小，论述亦嫌简单。

在文选学研究领域，骆鸿凯的专著《文选学》第四章专谈“体式”，对《文选》所选38种文体分别汇列相关的文体论述，希望借此使学者“明《文选》诸体之程式”，有较高的资料价值。^④汪辟疆的《与黄轩祖论〈文选〉分类书》虽就《文选》分类而作，但事实上对汉魏六朝文体分类与文体辨析之源流演变颇多发明。^⑤朱自清的《〈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则对萧统的文体思想有所阐发。^⑥

对于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研究，还没有见到专论性的文字发表，只有零星的关于《文心雕龙》文体论单篇文本疏证和释义性的文字。

关于“文笔、诗笔”的研究，则发表了刘师培、郭绍虞、逯钦立等

①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

③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④ 骆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⑤ 汪辟疆：《与黄轩祖论〈文选〉分类书》，《制言》半月刊1936年第18期；收入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⑥ 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国学季刊》1944年第4期；收入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

学者的10余篇论文。

在文体史研究领域，倒是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如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①、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②、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③。此外，刘麟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八论》，将文体史与文体论结合起来考察各体文学，值得注意。^④徐望之的《公牍通论》则对一些应用文体有所论述。^⑤

总之，20世纪前半期的汉魏六朝文体学研究成果不多，专论性的文字更是极为少见，文体论的研究处于一种散乱状态。不过，在这一时期，应该特别提出刘师培、郭绍虞、朱光潜三位先生对文体论研究的贡献。

刘师培先生的中古文学研究著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⑥《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⑦，饮誉学界，沾溉后人。而刘先生研究的一大特色便是极重文体，如《中国中古文学史》开篇便首辨明体，论文学之变迁亦从文体流变考察。他的关于《文心雕龙》的《颂赞》《诔碑》篇讲录对文体的考辨更是精义迭出。虽然刘先生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古典式的研究范式，但他从史料排比、钩沉出发，考文体界划、讹变的方法，仍应是我们在文体论研究中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郭绍虞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也是最早具有文体学学科意识的学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即发表了《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文章流别论〉与〈翰林论〉》《文笔与诗笔》《从永明体到律体》等文体论研究的重要论文。^⑧到了晚年，80年代初他又发表了《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一文，明确指出：“文体分类学不仅与修辞学有密切关系，即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也同样是个主要环节。”^⑨应该说，郭

① 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

②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③ 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④ 刘麟生主编：《中国文学八论》，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

⑤ 徐望之：《公牍通论》，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

⑥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⑦ 收入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论著三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⑧ 以上论文均收入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⑨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第547页。

绍虞先生的设想仍然是我们今天致力的目标。

朱光潜先生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诗论》一书，此书既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也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全面探讨了中国诗歌的艺术特征及历史源流，视野宏阔、立论通达，可以说是诗体研究的典范性著作。^①我认为此书在方法论上的意义重大，中西比较、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应是文体研究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20世纪50—80年代的研究情况

这一阶段，学术界低迷不振，只有数量稀少的文体论著作及相关的论著发表。

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都是1949年前著作的重印。关于文体论的研究未见任何改观。

关于《文选》分类的问题，则有郭绍虞《〈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和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二文较为重要。^②

对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研究，除继续发表了一些单篇的疏证札记外，开始出现了专论性的论文，如彭坚和王祖献的《从〈文心雕龙〉文体论谈到修辞学的体系》^③。

“文笔、诗笔”问题的讨论，在本阶段悄无声息。只有1978年，郭绍虞先生发表了《文笔说考辨》一文。^④

在相关的文体史研究方面亦类于上述情况。要之，此阶段的研究可称道者甚少，建树甚微。

（三）20世纪最后20年的研究情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学术界也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文体论及

① 朱光潜：《诗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② 均收入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

③ 彭坚、王祖献：《从〈文心雕龙〉文体论谈到修辞学的体系》，《安徽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④ 郭绍虞：《文笔说考辨》，《文艺论丛》1978年第3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

相关研究论著在本阶段渐成规模,文体学学科意识日益增强,文体论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为汉魏六朝文体论的全面总结和清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80年代后新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思想史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著作中,文体论的地位得到提升,不仅体现在篇幅比重上,而且还体现在对文体论认识的逐步深化上。特别是王运熙、杨明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①和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诸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②。《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多处章节涉及文体论,对总集的编纂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文笔说、《文心雕龙》论文体及其写作要求等皆设专节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专立“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研究”一章,设有“文集编纂与文学范围的划定”“魏晋南北朝的文体研究”二节,此书还搜集了不少文体方面的资料,表明著者对文体研究的重视。其他的一些著作对文体论论述的篇幅虽小,但亦不乏新见。如周勋初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中说:“考文体论的产生,是由研究朝廷公文格式开始的。”^③这就为我们寻究文体论的学术渊源多了一个视点。罗宗强师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认为“中国的文体论,最初似萌生于文体功用说”,“但是中国文体论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更直接的来源,那便是目录学。目录分类直接影响了文体分类,而有了文体分类,对不同文体之间差别的逐渐明晰的认识才成为可能”,“然目录学之文体分类,还不是文学文体论。文学文体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除了阐述不同文体的不同功用外,还应该研究不同文体的艺术体式特点”,“曹丕和陆机这一条线,是脱离目录学框架的文学文体论的开始,而挚虞的文体论,则是从目录学到文学文体论发展中的一个中间环节”^④。这些论述,清楚地描绘出了文学文体论产生的主要线索,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我们的研究思路。

《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研究在本阶段逐步被人重视起来,但也仅有二十余篇专论文章发表,研究质量仍不尽人意,大多是泛论之作。较有分量的论文有

① 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 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③ 周勋初:《周勋初文集》第二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④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01、107页。

罗宗强师的《刘勰文体论识微》^①、朱迎平的《〈文心雕龙〉文体论体系及其影响》^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研究总体上还很薄弱。

文体学研究在文选学研究中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论文对《文选》的文体观做了深入的挖掘,如王运熙《〈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沈玉成《〈文选〉的选录标准》、马积高《〈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中对“文”的看法的比较》、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曹道衡《从文学角度看〈文选〉所收齐梁应用文》等。^③而傅刚的专著《〈昭明文选〉研究》则是从文体的角度审视《文选》的一部力作。^④该书上编第二章“文体辨析与总集的编纂”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历史要求、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及与总集编纂的关系,是前所未见的关于汉魏六朝文体论最为全面的研究,而不局限于《文选》文体思想的研究上。作者同时又指出:“对南朝时期文体辨析的论述,必须与当时的批评理论结合起来考察。但这是一个独立的大题目,非本文所能完成。”傅刚的工作为汉魏六朝文体论史的逻辑建构构筑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一阶段,研究者的视野除集中于《文心雕龙》与《文选》外,还注意到了对其他文体文献的研究。如牟世金的《〈文章流别志·论〉原貌初探》^⑤,朱迎平的《六朝文学专科目录辑考》《〈文章缘起〉考辨》^⑥,对原始的文体文献做了可贵的考据辨析工作。徐志啸的《历代赋论辑要》^⑦,郁沅和张明高的《六朝诗话钩沉》^⑧,也帮助我们省却了不少研究中的翻检之劳。

对汉魏六朝文体论的发展历程做鸟瞰式考察的论文在本阶段开始出现。如穆克宏的《汉魏六朝文体论的发展》^⑨、吴承学师的《文体学源

①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

② 朱迎平:《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③ 以上论文均收入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

④ 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⑤ 牟世金:《〈文章流别志·论〉原貌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3期。

⑥ 二文均收入朱迎平:《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

⑦ 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⑧ 郁沅、张明高:《六朝诗话钩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⑨ 穆克宏:《汉魏六朝文体论的发展》,《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

流》^①，勾勒出了文体论之史的演进，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可资参考的大纲和轮廓。

文体史的研究也是成绩斐然。诗体方面有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②、吴小平《中古五言诗研究》^③，赋体方面有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④、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⑤、万光治《汉赋通论》^⑥、曹明纲《赋学概论》^⑦，骈文方面有莫道才《骈文通论》^⑧、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⑨，等等专著的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汪桂海的《汉代官文书制度》一书，虽着重从历史制度考察，但对汉代应用文的体制却多有论述，为汉代文体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⑩在这二十年还发表了一些文体史研究的单篇论文，如李伯敬《赋体源流辨》^⑪、章明寿《古代哀祭文发展简说》^⑫、徐国荣《先唐诔文的职能变迁》^⑬，以及吴承学师收入《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的文体史个案研究论文。文体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文体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应该说文体学研究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些文体概论性质的著作也陆续问世，推进了文体研究的进一步扩大和普及。如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是较早印行的一部。^⑭又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包括诗、赋、散文、骈文、词、小说、戏曲七

① 吴承学：《文体学源流》，《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收入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② 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③ 吴小平：《中古五言诗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④ 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⑤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⑥ 万光治：《汉赋通论》，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

⑦ 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⑧ 莫道才：《骈文通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⑨ 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

⑩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

⑪ 李伯敬：《赋体源流辨》，《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

⑫ 章明寿：《古代哀祭文发展简说》，《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

⑬ 徐国荣：《先唐诔文的职能变迁》，《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

⑭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